

邓小平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多维认知

张 振 王 东

内容提要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站在执政党生死存亡的高度坚持从严治党,逐步规范并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提供了重要保障。从历史-现实维度看,邓小平规范党内政治生活既是基于我们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经验教训的深刻反思,也是对改革开放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的及时回应;从路径-选择维度看,邓小平规范党内政治生活从保持党内稳定、发展党内民主、加强党内制度化建设三个方面展开,形成了一个系统性的践行机制;从实践-效果维度看,邓小平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凝聚了全党共识、激发了党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有序推动了党内民主。深入研究邓小平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思想,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加强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实践价值。

关键词 改革开放 邓小平 中国共产党 党内政治生活

张 振,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210023

王 东,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210023

全面从严治党是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总结历史经验与把握实情变化所提出的重大时代命题,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则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基本主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我们要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严肃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1]回顾改革开放的40年历程,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其成功奥秘在于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改革开放初期,面对纷繁复杂的世情发展、异常严峻的国情变化以及刻不容缓的党情革新任务,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高瞻远瞩,深入探讨建国以来党内政治生活建设的经验教训,坚持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以党内民主为重要抓手,从政治建设、组织建设、思想建设、作风建设等方面重塑党的形象,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规范性,

本文为2018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时代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多重逻辑与实践路径研究”(18BDJ048)、2016年江苏省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新媒体时代执政党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研究”(16MLA002)阶段性成果。

[1]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3页。

逐步探索出一条思想建党与制度建党相结合的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之路,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理论财富与实践经验。深入研究邓小平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思想,对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一、历史-现实维度:邓小平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动因

邓小平规范党内政治生活既是基于对我们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经验教训的深刻反思,也是对改革开放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的及时回应。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共产党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面临着繁重的“补课”任务,而十年“文革”的后遗症仍在:党内政治失范,党内民主功能未充分发挥,广大党员干部的民主权利得不到充分保障。正如邓小平当时所说:“我们搞建设有三十九年,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1]基于此,我们要努力揭示邓小平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真实动因。

第一,非正常化的党内政治生活的历史教训,坚定了邓小平严格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信念。邓小平作为中国共产党革命、建设、改革的亲历者,深知党在每个历史发展阶段的真实情况。一方面,党内政治生活失范使邓小平的政治历程异常坎坷,如建国后被错误划为“党内走资派”、“文革”中被打倒并被下放到江西农村等等;另一方面,党内政治生活失范带来的反右运动扩大化、“大跃进”等运动,给党和国家造成了巨大破坏和严重后果。这两个方面都促使邓小平深度思考“如何进行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自我革新、自我发展?”以及“如何严格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增强党的领导?”等问题。邓小平站在党发展全局的高度,满怀强烈的忧患意识探寻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建设途径。

第二,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成为了邓小平重新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历史契机。“文革”结束后的两年时间里,全党思想处于相对混乱的状态,社会主义中国的前途命运充满了不确定性。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是重塑中国社会的关键所在。而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则打开了这个历史突破口。在这场理论较量中,邓小平等人以成熟政治家的敏锐、坚毅和不屈不挠的精神,率先从理论上指出“两个凡是”的错误所在,揭开了思想解放的序幕^[2]。“就全国范围来说,就大的方面来说,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和‘两个凡是’的争论,已经比较明确地解决了我们的思想路线问题,重新恢复和发展了毛泽东同志倡导的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3]邓小平进一步指出:“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基本建设,不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不解放思想,正确的政治路线就制定不出来,制定了也贯彻不下去。”^[4]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促使全党认真反思历史教训,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思想先导。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此为契机,逐渐掌握了历史转折的主动权,做出了改革开放这一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

第三,改革开放的实情变化,推动了邓小平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持续开展。邓小平科学研判“和平”与“发展”为当今时代主题,将党的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以发展为第一要务,开创了改革开放的全新局面。与此同时,党的自身建设和现代化发展面临的挑战与日俱增,规范党内政治生活需要持续开展。一是改革开放使党内思想建设、制度建设、政治建设、作风建设等领域出现了新情况;二是现代化建设给党的领导能力和执政能力建设提出了新的课题;三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遇了巨大的挫折,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使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巨大的变革压力。可以说,改革开放后,诸多现实情况发生了变化,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不仅是经济社会改革发展的需要,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与执政水平的需要,而且是世界范围内展现中国共产党的良好形象、助力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需要。

[1]《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6页。

[2]朱乔森:《中国共产党历史与经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年版,第153页。

[3][4]《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0页,第191页。

二、路径-选择维度:邓小平多层面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践行机制

对于如何严格规范党内政治生活、构建健康的党内政治生态,邓小平总的思路是坚持社会主义这一根本原则不动摇。针对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结合改革开放过程中党的建设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从保持党内稳定、发展党内民主、加强党内制度化建设三个方面展开,形成一个系统性的践行机制。邓小平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实践举措,反映出邓小平本人对执政党建设规律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入。

1. 坚持社会主义是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根本原则

坚持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立党根基,是国家实现富强的根本所在。坚持社会主义,是邓小平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根本原则。

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旗帜鲜明地指出:“我们总的原则是四个坚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已经写进中国的宪法。”^[1]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苏东剧变对社会主义运动带来了灾难性影响,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巨大的政治压力。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维护党的领导和党中央的权威,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稳定发展,最大程度上保证了改革开放所取得的伟大成就。

面对重大政治考验,邓小平曾尖锐地指出:“现在,我们的党员有了三千八百万。如果这三千八百万都合格,那将是一支多么伟大的力量!问题是一部分党员不合格,要在教育的基础上进行整顿。”^[2]在改革开放大环境下,党员个体的自主性显著增强,加强社会主义信仰教育成为党内政治生活建设的重要任务。邓小平注重党员信仰的树立,在全党全国范围内展开了整党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并提出了“坚持标准、保证质量、改善结构、慎重发展”的发展党员工作方针;在党员干部的选拔培养中,邓小平提出了“四化”的指导方针,将坚持社会主义作为首要方针加以执行。邓小平在同第三代党中央领导集体谈话时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不能动摇。这一点我任何时候都没有让过步。”^[3]这个时期的党内政治生活建设始终围绕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中心展开,着力增强党员的党性,净化党风,提升党的战斗力。“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是我们党、我们国家生存、发展的政治基石。”^[4]这是十七大上的话语表达,是对邓小平政治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是毫不动摇坚持社会主义的庄严宣告。

2. 保持党内稳定是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

执政党的党内稳定事关国家和社会大局,是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的前提。保持党内稳定,是邓小平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

邓小平说:“在中国来说,谁有资格犯大错误?就是中国共产党。犯了错误影响也最大。”^[5]作为执政党,只有党内稳定,才不容易犯错误。邓小平高度重视党内稳定,坚持保证思想路线、组织路线、政治路线的正确性和连续性。在取得党内共识的情况下,邓小平随即着手对党内若干问题进行历史评价,其参与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和发布的全过程。决议对建国以来的重大历史问题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毛泽东的功过是非和毛泽东思想基本内容与指导意义作了总结和评价,并肯定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逐步确立的方针政策。决议在思想上凝聚全党力量,促使党内

[1][2]《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4页,第269页。

[3]《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9页。

[4]《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6页。

[5]《邓小平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0页。

政治生活走向稳定和谐的新局面。与此同时,邓小平突出强调了“核心”的作用,他明确指出:“我们的党是有高度统一意志的革命的党,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党一定要有领袖,有领导核心。……领袖就是团结的力量,他本身就是力量。中国革命之所以取得胜利,就是因为有了毛泽东这样的领袖。领袖与集体领导是不矛盾的。”^[1]邓小平坚持实行的领导核心体制是其留下的非常重要的政治资产,不仅对党和国家以及军队具有开创性的历史意义,而且保证了中国改革开放沿着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这与同时期苏联共产党亡党、苏联国家解体形成了鲜明比照^[2]。

党内稳定带来了中国社会的高速发展,我国综合国力显著提高。但与此同时,资产阶级自由化以及西方和平演变也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极大的不良影响,并引发了20世纪80年代末相关事件的发生,这给党和国家事业造成了巨大损失。邓小平在多个场合严肃指出:“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3]要想应对国际大气候、国内小气候的多因素冲击,只有党中央形成一个强有力的核心领导层,党的各级组织形成一个稳定有序的权力系统,保证党内政治生活在民主集中制下健康运行,保证正确的政治路线顺利贯彻,才能在国内国际形势纷繁复杂的变化中沉着应对。

3. 发展党内民主是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基本目标

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对人民民主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带动作用。积极发展党内民主,是邓小平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基本目标。

第一,从民主原则来看,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民主集中制。“我们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这就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民主集中制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不可分的组成部分。”^[4]邓小平将民主置于基础性的地位,并将其看作是政党建设的核心内容。第二,从民主关系来看,邓小平将党内民主放在基础位置,以此发展人民民主。党内民主是执政党长期发展的强大动力。邓小平在总结历史教训时指出:“我们党一定要造成这样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我们党内一定要有充分的民主。”^[5]分散主义、命令主义的存在曾严重削弱了党内民主,个人集权主义的高度发展使得一段时间内党内政治生活出现万马齐喑的状态。不仅如此,党内民主更是与改革开放的持续推进密切相关。邓小平说:“我们各种政治制度改革和经济制度的改革,要坚定地、有步骤地继续进行。这些改革的总方向,都是为了发扬和保证党内民主,发扬和保证人民民主。”^[6]社会监督是推动党内民主发展的重要举措。邓小平认为中国共产党不仅要接受党内监督,也要接受群众的监督,要解决党风问题,接受群众的监督是试金石。邓小平指出:“我们有解放后的前十年的经验,那十年,我们的风气相当正。而且那个时候确实有群众监督,是广泛的群众运动,是深入细致的工作。儿童有礼貌,关心集体事业,关心公共秩序,看到不对头的地方就批评。”^[7]

4. 加强党内政治生活制度化建设是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主要方法

制度是推动从严治党、构建法治社会的基础要素。加强党内政治生活制度化建设,是邓小平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主要方法。

邓小平同志曾指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

[1]《邓小平文集(1949—1974)》(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22页。

[2]胡鞍钢:《创新中国集体领导体制》,〔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版,第18页。

[3]《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0页,第284页。

[4][6]《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5页,第372页。

[5][7]《邓小平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6页,第290页。

至会走向反面。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1]。1980年2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包括十二条:坚持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坚持集体领导,反对个人专断;维护党的集中统一,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坚持党性,根绝派性;要讲真话,言行一致;发扬党内民主,正确对待不同意见;保障党员的权利不受侵犯;选举要充分体现选举人的意志;同错误倾向和坏人坏事作斗争;正确对待犯错误的同志;接受党和群众的监督,不准搞特权;努力学习,做到又红又专。全会要求,在贯彻执行《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的过程中,要结合对党章修改草案的讨论,在全党进行一次坚持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加强党的团结和统一、加强党的民主集中制和组织纪律性的思想政治教育^[2]。这是改革开放之初党内政治生活制度化的最初尝试。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中第一次使用了“制度建设”的概念,并提出要“在党的建设上走出一条不搞政治运动,而靠改革和制度建设的新路子”^[3]。在党内政治生活制度建设上,邓小平始终注重构建保障普通党员权利义务关系的制度规范,在相关场合多次论述具体的制度设想,如强调“制度建设的中心是民主制度。民主制度的关键在于首先健全党内的民主生活,而党员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则是最适当的组织形式,应定期召开,认真进行;其次则为机关内的民主生活制度的建立,而机关工作人员的代表会议和小组会议,以及每年一次的民主检讨制度,均应按期进行”^[4]。对于领导干部退休制度的建立,邓小平倾注了大量的精力。1980年8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了邓小平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1982年中央发布《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意在有步骤地实现新老干部的交替。在腐败问题上,邓小平从预防和惩治两个方面入手,下大决心惩治腐败,在党内初步实现了制度反腐:狠抓反腐倡廉教育机制,出台了一系列文件;完善反腐倡廉专项治理机制,以整党整风方式进行整治;构建反腐倡廉纪检监察机制,重新设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并出台相关配套法律法规。

邓小平在制度设计上坚持民主化与法制化的指向,兼顾政治顶层的大局意识和政治基层的利益诉求,维护党内政治生活的整体性;在制度改革上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党内政治生活的实现形式与监督方法,在实现思想建党向制度建党转变的过程中进行制度治党的新尝试;在制度模式上更加注重党内政治生活的实际情况,将领导人接班选拔与普通党员精神文明建设并举,以一种更加开放的姿态面对党内的利益格局,提高组织、个人的制度化意识,有效地解决了党内政治生活制度化供给不足的突出问题。从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制度内容上来看,邓小平将路线建设贯穿始终:他在党内开创了以思想解放为中心的思想路线发挥引领作用、以选好接班人为中心的组织路线发挥保证作用、以人民民主为中心的政治路线发挥统筹作用、以实现根本利益为中心的群众路线发挥凝聚作用的党内政治生活新局面。其中思想路线是党内政治生活的灵魂,组织路线是党内政治生活的保证,政治路线是党内政治生活的目标,群众路线是党内政治生活的立足点。邓小平对上述路线综合考量又加以突出重点,是其取得严格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党内政治生态伟大成果的一大法宝。

三、实践—效果维度:邓小平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实践成效

邓小平不仅在多个维度上继承了先前党内政治生活的优良传统,而且根据改革开放以来局势的

[1]《江泽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9页。

[2]《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北京〕《人民日报》,1980年3月15日。

[3]《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日报》1987年11月4日。

[4]《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2页。

新变化进行了大胆创新与变革。这些举措使党内对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形成了共识,实现了党内的又一次大团结局面;确立了党员的主体地位、党组织的载体承担功能以及领导干部尤其是高层干部的示范作用;有序推进了党内民主、党内制度化建设,使得党内政治生活重新焕发勃勃生机。

1. 凝聚了全党共识,党内高度统一和团结

一方面,邓小平改变了“文革”引发的无政府状态,初步解决了由权威危机和权力危机带来的社会混乱问题。严格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坚持和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反对和防止分散主义,要求每个共产党员特别是各级党委的成员,都必须坚决执行党委的决定^[1],逐步强化党的领导。另一方面,邓小平初步实现了党内政治生活在权力垂直运行向度上的合理分配,重新建立起从中央到地方再到基层有效的管理体系,形成了中央统筹全局、基层认真执行的良好合作局面,有效解决了保障党中央的权威和适当分权各级党组织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使得全党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形成了又一次大团结局面。

党内的高度团结体现在党中央的集体领导与各级党组织政策执行的良好互动上。首先,党中央领导班子实现了有步骤地顺利交接,形成了一个凝聚全党共识、平衡各方诉求的强有力的领导集体,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集体领导体制;其次,党的形象与威望得到恢复,一些重大会议以及相关领导人的讲话使得全党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共渡难关,最大程度上发挥出党的合力;再次,党中央坚定执行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边改革、边整顿秩序,取得了经济社会建设的巨大飞跃,让全党全国人民感到这是一个实行改革有希望的新时期。最重要的是,党中央有效应对了改革开放以来因社会自主性提升带来的治理考验,凝聚了改革是强国之路的思想共识。同时,各级党组织自主性进一步加强,组织建设充满活力。一方面各级党组织党内生活恢复正常,坚决贯彻执行中央的思想路线、组织路线以及政治路线,更为自觉地拥护党中央以及上级党组织的领导;另一方面新党章的制定,明确了党员个体的权利与义务,要求党内政治生活的主体行为在相关规定下进行,进一步增强了党内生活的纪律性和规范性。

2. 激发了党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党内呈现民主和谐新局面

邓小平十分重视保障党员的基本权利,把它看作是发展党内民主的中心环节。在持续严格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过程中,党员个体与党内政治生活的双向互动,不仅严格规范了个体行为,也使得政治生活落到实处。首先,党员的权利和义务得到明确,党员个体的主人翁地位进一步确立,党内同志的平等关系得到强化。正如邓小平所说,“不论是担负领导工作的党员,或者是普通党员,都应以平等态度互相对待,都平等地享有一切应当享有的权利,履行一切应当履行的义务。”^[2]这种民主氛围的营造极大增强了党员参与政治生活的积极性,为长期严格规范党内政治生活提供了强大支撑。其次,党员党性得到较大提升,党内存在的派系逐渐根绝,党员中存在的落后思想进一步被消除,党内政治生活开始形成风清气正的良好势头。再次,党员自身建设成效显著,一大批优秀党员纷纷涌现,得到了广大民众的支持和赞誉,这些优秀党员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充当改革典型、劳动模范,社会上逐渐形成党员带动、人民参与的建设新局面。

与此同时,各级党组织的功能与效用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组织力量显著增强。党组织是群体结构化、功能化的体现,是党员参与党内政治生活的平台,是执政党进行执政活动的重要载体。邓小

[1]《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北京〕《人民日报》1980年3月15日。

[2]《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1页。

平时期的中共党组织改变了以往高度集中性和完全政治性的重要特征,组织内部发生了显著变化。首先,党组织初步显现出从政治权力唯一到社会权力、政治权力并行的“社会政治”色彩,党组织在政治性之外开始兼具社会性,成为一个容纳多种利益诉求、表达多种利益的组织;其次,党组织的领导改变了原来单一的命令、指挥、发动群众运动的方式,逐步走向依法、依宪、依章的多组合制度化方式;再次,党组织逐步成为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其在兼具政治性功能的同时,也在积极拓展自身职能,增强自我的社会属性,在日常生活和社会整体进步中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不难看出,邓小平实现了党内政治生活在权力水平运行向度上形成充分合力,极大激发了党员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使党组织成为党员参与政治生活最直接的舞台,形成了党组织牵头搭台、党员热情参与表演的生动历史话剧,有效解决了党组织领导的全局性与党员个体利益诉求自主性的观念性矛盾,构建起党内政治生活互相融合的和谐局面。

3. 以改革促发展,党的建设制度化效果明显

邓小平严格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主要方法是加强制度化建设,其在改革开放实情的变化中不断探索与完善,实现了党的制度建设的一次历史性飞跃。党内政治生活走向制度化、民主化、法制化,推动中国共产党由一个传统型革命政党转变为民主型建设政党,顺应了时代发展的历史潮流。在恢复与发展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党内组织工作制度以及党内监督制度等制度的同时,全党深化了对党规党法与国家法律协调发展的认识。邓小平所指出:“国要有国法,党要有党规……没有党规党法,国法就很难保障。”^[1]在当时极为严峻的国内国际背景下,严格规范党内政治生活锻造了具有高度凝聚力的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向世界证明了社会主义政党自我改革的能力。以改革的方法推动党内政治生活的制度化建设,主要体现在党内民主制度、党的干部人事制度、党内监督制度三个主要方面。从党内民主制度来看,严格党内政治生活所形成的党内民主进一步推动了社会民主的发展,民众得到更为具体的权利保障;从党的干部人事制度来看,稳定的党内政治格局以及干部人才队伍初步形成;从党内监督制度来看,监督的顶层设计与执行力度都在持续强化与完善之中。民众切实感受到了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的提升,严格规范党内政治生活进一步密切联系了广大群众,夯实了党的社会基础。

可以说,邓小平时期党内政治生活的基本格局已经形成。就中国共产党党内发展来看,严格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初步形成了地方服从中央、党员个人服从党的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的“四个服从”局面,构建出中央尊重地方、党组织尊重党员个人、多数尊重少数、上级组织尊重下级组织的“四个尊重”局面,营造出良好的党内政治生态。在社会发展方面,中国共产党担负起更为艰巨的经济建设任务。中国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封闭到开放、从落后到跨越式发展,这一切得益于中国共产党自身坚持与时俱进、狠抓落实。严格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塑造了具有强大凝聚力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在经济社会建设中充分展现执政能力,朝着科学执政的方向前进;各级党员干部通过不断学习,改善自我、发展自我,努力适应新条件下社会发展的要求,认识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积极构建公平、公正的社会秩序。

[责任编辑:史拴拴]

[1]《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7页。